

從二元經濟論到篩選理論

——讀多爾的《文憑病——教育、資格和發展》

◎ 孫傳釗

從今年第三期《讀書》的鄭秉文〈股票·福利·經濟制度〉一文知道英國LSE「經濟運作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今年78歲高齡的多爾（Ronald Philip. Dore, 1925- ）教授老當益壯依然活躍在學術界，去年出版了《股票資本主義與福利資本主義——英美模式與日德模式的比較》一書。鄭文稱讚這書給了人們「一個非常新穎而超常的回答」。這使我想起多爾早年從事不發達國家的發展研究寫的一部研究「學歷病」的專著：《文憑病——教育、資格和發展》（*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6）。兩年後此書日文版的譯者松居弘道徵求了多爾本人的意見後，把書名譯成《學歷社會——新的文明病》（岩波書店，1978）。日文版出版後，在日本學界的引起極大的反響，對當年日本學歷社會的研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英國，隔了整整20年，1997年又重版了經過修改和補充的《文憑病》，足見它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多爾畢業於倫敦大學日本言語文化專業。50年代留學東京大學，以後在日本研究領域中取得相當業績，在日本學術界有「歐美研究日本第一人」之稱。1965年他的《江戶時代的教育》一書問世，曾引起日本學術界的轟動，也以此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他以詳實的史料證實了這麼一個史實：「江戶時代日本的初等教育已經相當普及而且具有重視近代實學的傾向，此乃明治維新的社會動力之一，明治時期的近代教育不過是江戶時代後期教育的延伸」。多爾是位頭腦犀利、敏銳的學者，長期從事各國社會發展等宏觀的比較研究，時常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

50年代，阿瑟·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 1979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提出的發展中國家是由現代經濟部門和傳統的農業部門組成的「二元經濟結構論」。二元經濟（Dual Economy）模型雖然有多種樣式，但是劉易斯把這些模型歸納成三個特徵：「第一，它包括『現代的』與『傳統的』這兩個部門。現代部門通過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動力而得到發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質量和同等數量的勞動條件下，非熟練勞動者在現代部門比在傳統部門得到更多的工資。第三，在現行工資水平下，對現代部門勞動力的供給超過這個部門的勞動力需求。就這個意義來說，發展之初非熟練勞動者是充裕的」¹。劉易斯批評舒爾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的人力資本論的局限。他指出，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論》（1961）「試圖對收入統計和教育成就進行相關分析，從而在一個整體經濟的基礎上計算美國教育的生產率」，「但這一努力的結果幾乎不能運用於不發達國家。這有三個主要原因：1、它假定收入模式會對生產率產生不同的影響，這是很值得懷疑的。2、即使在收入反映了生產率的地方，教育和導致高生產率的其他原因（特別是智力、忍耐力和其他說服人的能力）之間也存在著

很高的相關性。所以，在確定收入差別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教育之前，必須首先把上述因素和教育區分開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注意到了在學校教育中學生所學到的課程不符合現實的需要（即使在學院的水平上也只有不到30%的課程是科學或技術技能的訓練），僱主們可能願意付給文科畢業生更高的工資，不是因為他們在學校里學到的知識如何廣博高深，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在學校教育所強加的各種測驗中生存下來的能力——學校裏的競爭、生存能力。³、這種相互關係在不發達國家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它們的邊際收入和平均收入差別很大。在亞洲的大部分國家，受教育者也存在著大量失業現象，教育和邊際收入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引出這樣的結論：較高教育的邊際生產率為負數。在美國進行這類計算的時候，完全可以假定經濟能夠迅速地吸收任何數量的受教育者。因為美國擁有的工業和服務業能夠容納教育體系的畢業生，而且整個經濟可以建立在任何給定的教育水平上。但是不發達國家，情況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吸收能力受到了下面這個基本事實的嚴格限制，那就是一半以上人口都出在落後的農業部門。提高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就會隨之它在經濟環境中發展變化得太快，教育就不能被有效地加以利用」²。劉易斯指出，當畢業生和勞動力市場的關係，供小於求時，教育是投資；反之，則是單純的消費³。他的這些論點雖然沒有像以後的從人力資本論陣營中分裂出來的篩選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代表人物邁克爾·史潘斯（M. Spence）等人那樣極端地完全否定教育的培養人才的功能（史潘斯他們認為教育成本和天賦能力呈負相關，能力較高的人可以以低成本獲得較高的教育水平，或者說用同樣的成本，能力較高的人可以比能力較低的人獲得更高的教育水平，而能力並非是教育的結果），但是成了篩選理論的主要理論依據。篩選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僱主事先不能直接了解應聘者的能力，而進行專業培訓需要承擔相當的投資，但是，學校教育終究在入口（入學）和出口（畢業）進行過兩次篩選，所以，僱主把教育的證書——文憑作為勞動力篩選的一種「信號」、一種標準來利用。顯然，多爾是站在二元經濟論和篩選理論的一邊。他的貢獻是用歷史比較的方法解明了人們的質疑，即回答了以下的問題：60年代發達工業國家高等教育也發展得相當快，為甚麼沒有像發展中國家那樣爆發「文憑病」？

二

多爾在《文憑病》中，是基於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來展開的他所謂的「後發效應」的論點的。他指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引起的反差特別厲害。現代部門各行各業都已參照今天先進工業國家的標準要求業者必須擁有某種學歷文憑、資格證書，而現代部門各行各業的收入又遠高於傳統部門的幾倍乃至幾十倍。人往高處走，傳統部門的國民紛紛要湧入現代部門，而要進入現代部門先決條件要取得一張入場券，現代學校教育不僅肩負著傳授知識技能的職能，還起著製造這入場券，即畢業文憑、資格證書的功能——人才及個人收益的分配的社會功能。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的所得個人收入實在相差太懸殊了。他舉例：60年代末，烏干達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是國民平均工資的50倍。即使40年代已獨立的號稱民主國家的印度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也高達未過受高等教育者的12倍。就連坦桑尼亞政府僱用的最低國家機關公務員的工資也高達國民平均所得的5倍。這麼巨大的格差、懸殊的工資，傳統部門中的家長當然渴望自己的孩子通過學校這個通往現代部門中介的羊腸小道到達現代部門的彼岸。雖然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教育體系中的入學考試的競爭是異常激烈的。而且，60年代是舒爾茨《教育與經濟增長》、《人力資本投資》（1961）、丹尼森《美國經濟增長之源和我們面臨的選擇》（1962）、《教育貢獻的力量》（1964）和見克爾《人力資本投資：一種理論分析》（1962）、《人力資本：特別關於教育的理論與經驗分析》（1964）等著作風靡一時的時

代。而這人力資本投資論統治了教育經濟學時代也正是非洲國家擺脫殖民統治相繼獨立的時代。這些發展中國家很快發現不僅資金、物質是發展的要因，本國現代社會的技術人材、管理人材的匱乏同樣也是發展的障礙。各國就紛紛按照人力資源投資的模式來規劃國家的教育事業。於是，從小學到大學的就學人數激增。可以說，數年後這些發展中國家許多經濟開發計劃未能完成、半途而廢，但是教育卻是超計劃完成多於未完成計劃的。教育要大躍進嗎？容易。發展中國家想出種種辦法。師資不夠，開設速成師範學院，「南郭」先生們紛紛登上講台，甚至實施高年級學生任課的「小先生制」；學生過多，班級學生數擴大，採用復式教學提高時間、空間的效率；資金不夠，攤派給地方政府，再加上中央政府補助。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要發展高等教育，也不難，印度的速成方法是以一個大學為中心，辦幾所衛星大學也能啟動「高等教育大眾化」。1960年至1966年發展中國家初等教育入學人數平均增長42%，年遞增率6%；中等教育增長80%，年遞增率為10.2%；高等教育增長了93%，年遞增率為11.6%⁴。

但是，進入70年代不久，人們開始對這種大躍進產生了懷疑的態度和幻滅的情緒。原因有：一、各國政府不堪負擔逐年增長的教育經費的開支。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統計，不少發展中國家60年代初教育經費僅佔政府行政開支的10%–15%，60年代末卻已經達到20%–25%了。60年代發展中國家平均教育投資佔國民經濟總值GNP的2.4%，到1970年上升到3.4%。二、高學歷者失業問題，不僅造成教育投資的浪費，還會引起青年學生運動。從1950年到1970年，印度教育投資增加了13.4倍，中等學校在校生增加了近3倍，高等學校在校生增加了近5.5倍。但是沒有如同人力資本論所說的那樣——高學歷者的就業的適應能力也將提高，從而可以降低失業率。三、發展中國家雖然學生的入學率大幅度提高，但是，輟學率也高，而且質量低下。小學畢業生如果以後沒有讀書、看報的機會，很快又變成新文盲和半文盲。因此，劉易斯和多爾等對人力資本論是否適用於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質疑。劉易斯說：「通過改變工作的學歷要求以及調整相對收入水平，一個國家幾乎可以吸收任何數量的受教育者」。因而，勞動力市場上，「僱主提高了他們的要求，而受教育者降低了他們的目標」，「沒有找到稱心如意的公眾，或者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工資水平」⁵

這第二個問題，即使已經進入先進工業大國行列的日本也不例外。多爾在此書日文版的序言中描寫了1978年日本就業風景的一個側面⁶：

出租車司機都要求大學畢業學歷的時代到來了。讀到報上一則新聞：今年京都一家出租汽車公司招50名大學畢業學歷的司機。這種學士司機可不是通常那種出租車司機，他們像諮詢員那樣，不論是甚麼樣乘客，都能被他們滿意地送到目的地。學士司機甚至能背下電話簿所載的許多企業的電話號碼。

經濟起飛後的日本，70年代高中普及率超過90%的同時開始邁出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步伐，不到十年功夫就出現了僱主對學歷要求大幅升格現象。多爾和劉易斯一樣，也認為，這種企業招聘員工時學歷要求升格（escalation），其實也就是學歷貶值，高學歷者失業或隱性失業）。歸結起來，有三個原因：一、大學畢業生過剩，當遇到經濟蕭條的年份，就業困難（供給主導型）；二、求人企業為了競爭。儘管自己企業不需要大學畢業，但社會上一般都認為大學畢業生素質高於高中畢業生，會提高企業效率而且又能為企業裝潢門面，豈非出奇制勝（需求主導型）。三、企業能把握、操縱高學歷就業者心理，降格到低層次職業就業高學歷者有一種劣等感、失落感。比如，上述日本的出租汽車公司把公司名改為「××移動中心」，把司機根據英語driver的發音用外來語讀作「ドライパー」來安慰他們的心理上的不

平衡。一個公司僱用了「學士司機」，各公司相繼效仿，久而久之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習以為常，學歷要求升格的「梯子」越升越高。其實，美國在70年代中，人力資本論也受到了挑戰。石油危機的沖擊下，經濟不景氣，就業狀況惡化，兩年制社區大學畢業生就業難，一時間許多社區大學因為生源枯竭，紛紛倒閉。

和篩選理論的代表學者史潘斯等人一樣，多爾把學歷社會這「文明病」的症狀歸結為：一、畢業文憑、資格證書被利用作甄別、選擇就業者的作用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二、教育過剩，學歷貶值，高學歷者失業增多；三、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意味著教育投資的浪費，也會因為失業增加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但是，除了這三條外，多爾感到最痛心的是教育的變質，「追求知識、真理的教育蛻變為追求學歷文憑的教育，教育的相對的實質水準普遍下降，受教育者關心的只是為了獲得『證明自己曾經學習過的一張證明』」。他指出，如果在追求知識的同時也考慮將來的生計和收入，這是無可非議的，也是與教育自身的價值一致的。但是單純為了獲得文憑、證書，知識完全成了一種手段，是對教育的冒瀆。這樣的學生增多，我們將面臨一種社會文化質的危機。如果僅此而言，那麼，多爾不過是援引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和史潘斯、思羅等人的篩選理論罷了。但是，多爾的學術貢獻在於通過歷史比較的方法，提出了與發達工業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有一個「文憑病」的「後發效應」問題：現代工業化發展起步越滯後的國家，上述三種症狀來得越快，發病更凶猛，治療起來也最困難。

多爾為了論證他的結論，對英國、日本、斯里蘭卡、肯尼亞這四個現代工業化開始時期的先後順序呈現階梯狀的四個國家近代教育制度發展的歷史及現狀進行分析、比較。他認為學歷社會「文明病」的「病原體」起源於英國這個資本主義產業革命最早的國家。英國產業革命開始後，經濟飛速成長，但很長一段時期內，教育的改革處於滯後的狀態。學校教育在產業革命初期並沒有為社會階層移動開闢道路，卻使社會階層分化、固定，積極地起著分層化的作用和功能。國家對教育制度的監督、干預並產生影響是工業化相當深入以後的事情，而國家為了促進或維持經濟增長提出有計劃地培養人才更是以後的事情了。換言之，在英國工業化很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中，教育並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過影響。讓優秀的下層社會子女接受教育，讓他們也流入中產階層職業行列中去，只是經濟相當發展後的一種以學歷精英為標準的社會階層的「庇護移動」。政府不得不替代血統、門蔭，制訂、實施這種以學歷為標準的「庇護移動」政策，則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事情。

另一方面，上述教育制度化發生之前，傳統社會延續下來的手工業者、小生產者的手藝、技能，技術大多是通過在家族中藝徒制度傳授的。他們職業的繼承是由就業所需的手藝、技術、技能的習熟程度來決定，雖然某種程度上為學校教育內容所左右，但與學校所頒發資格證書沒有任何關係，隨著學歷病的惡化，學校教育的質變也逐步侵蝕到技術傳授領域中來了，就業的各種手藝、技能、技術資格基準被規定、限制起來，最初是由民間的同業公會決定資格基準及證書頒發，慢慢地這種資格證書審批權限被政府機關所取代，這種取代是最直接與公共社會福利事業有關的醫生資格審批開始。最終，技術傳授領域的知識的傳授、資格的審批一攬子都歸入了學校教育系統中去，學校教育目的及其功能徹底蛻變。英國的學歷貶值，就業所要求的文憑、資格證書的升格，是在十七世紀產業革命至二十世紀初兩個多世紀中緩慢地進行著。雖然二十世紀初隨著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現代部門空前擴大，「學歷病」也以前所未有速度惡化、普及，但這種過程的速度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是相當緩慢的。多爾的老家英國雖是學歷社會文明病的源頭，但卻是先進工業國家中有著最輕視學歷風氣傳統國家，因為克倫威爾時代以後，雖然曾經歷過法國拿破侖帝政時期為產業界、政治界培養

人才狂熱地設立學校的那段歷史，但是，至今英國仍是工業國家中大學大眾化步伐走得最慢的國家之一。然而，見染上大英帝國身上的「病毒」的，曾在其殖民統治下的南亞次大陸印度，二十世紀初的「疫情」已使當時殖民地政府當局也感到是一種威脅，是一種危機。當時的總督坎遜對因追求學歷—追求高職位、高薪金的民眾刺激下的高等教育機構的迅速增加採取了斷然措施。1902年他在議會的演說中如是說：

不是追求學問（learning）而是追受收入（earning）的小伙子們充滿了印度的各個大學。不採取必要的措施的話，所有的教育機關會象雪崩那樣連鎖瓦解。教育必要性、教育的質量等甚麼基準都不考慮，放任無限制增加大學，也許也是可以的。但是入學考試地獄般的勞苦仍將會變本加厲地懲罰下一代，最終的結果是整個社會的教育水準的下降。放棄追求真知的教育，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是量的不斷擴大，我們將犧牲理性的文化遺產，制造出平庸的人才。將來我們會陷於一種後悔莫及的痛苦之中。

但是，獨立後的印度這種「文明病」再度猖獗蔓延。英國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大學體系、制度——可以由一所有名的大學代理新設水準低下的衛星大學發行學位證書來迎合了國民的教育消費的急切需要。於是，70年代初，印度成了世界上大學畢業的公共汽車售票員的發源地。當時有6萬名失業的工科畢業生。其中不少人還擁有碩士學位。這一點連最初關注這問題的劉易斯當年也沒有預測到。他在50年代末，只是強調要節制文科高等教育的規模，認為發展中國家理工科高等教育的無限發展是沒有隱患的⁷。教育行政權限在地方政府手裏，印度中央政府的干預也鞭長莫及。可能大學畢業的售票員比只受過中等教育同事工作幹得稍出色一些，但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痛心的，因為全印度還有60%的兒童無法接受初等教育；許多出色的青年精英流入了西方的科技界、學術界。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和日本經濟近代化幾乎是同時進步、發展的，與英國相比歷史短，但是加速快，有「後發效應」。所以，「文憑病」的發病也早。多爾舉了最典型的例子：明治維新後僅十年，政府就正式制訂了東京帝國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一年後的政府官員錄用考試制度中又規定了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生可免除考試，學校教育制度開始和公務員制度「並軌」，前者成了後者的附庸。而英國是工業化開始了一個多世紀後才實施國家公務員考試制度的。1910年日本的大多企業和報社招聘新職員是已有必須大學畢業的規定，對學歷的要求已遠遠超過了同一時期的英國。本世紀初的20年中，日本一流企業家中已有70%是大學畢業或高等專科學校的畢業生，而英國直到1958年企業經營者中只有20%是大學畢業的，即使一流企業高級幹部中也只佔24%。與英國相比，在學歷很早就起著決定就業機會的作用問題上，日本的「後發效應」是顯而易見的。

多爾指出，因為日本是個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開始時可照搬仿制西洋各國的政治制度、企業組織制度、教育考試制度等現成的制度模式。英國緩慢地發展著資本主義，在漫長的過程中只需要維持、繼承原有事業的人才，而日本急需的是懂得西洋近代科學技術、制度思想的和本國傳統決裂的激進變革人才；也正因為如此，英國舊式貴族學校就能在漸進的變革中延續下來。如何適應新的人才要求甄別、遴選人才呢？近代學校也就兼負起了考試機構的作用。

多爾認為不同國家文憑病「症狀」差異是由「後發要因」和「文化要因」兩種要因決定的。上述種種就是日本的後發要因。日本的文化要因有兩點：一、江戶時代儒學的影響，與崇尚實利英國相比，國民心目中教育有更高的價值；二、明治前傳統的武士的兩個職能——渴望成為軍人、政治家的傳統仍是青年一代野心目標，所以，通過大學走上職業官僚的道路成了

青年們的理想。

日本雖是後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國，畢竟與經過長期殖民統治的斯里蘭卡、坦桑尼亞不一樣，儘管也出現本科畢業的「學士司機」這種文憑貶值的「症狀」，卻很幸運，因為二戰以後，勞動市場一直能保持很低失業率，所以高學歷者失業沒成為社會問題。與多爾最初寫這本書的70年代相比，今天日本的教育面臨的問題則是：一、因出生率逐年下降，已進入了人人可以上大學的時代，青年人連「應試」的學習動力也失去了，大學成了傳授社會常識的場所；二、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的經濟衰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也進入了「冰河期」；三、70年代大學大眾化的主力——三流私立大學正面臨倒閉的危機。

斯里蘭卡獨立之後，50年代初一掃英國殖民遺風，重建單軌制無階級差別的學校體系，並實行小學義務教育。給貧困階層的斯里蘭卡人帶來了一絲通向學歷頂峰的希望，儘管只有1.5%的同齡人能達到這令人羨慕的高處，而在幸運者中，中產階級子女卻佔了很高比例，但是，這種制度在國民中留下了公平競爭的深刻印象。60年代中這個國家小學入學率高達90%以上，但100人中只有一人能達到那誘人的光輝耀眼的頂點。1971年斯里蘭卡失業率高達15%，失業者的80%是25歲以下的青年，他們的學歷大多與他們憧憬的門坎僅一步之遙。獨立後的20年中，政府曾兩次企圖早期通過分流，來實行英國式雙軌制的教育體制，但都遭到了國民們強烈的抵抗。抵抗來自國民們對教育機會均等的信仰，家長們難以接受自己孩子過早地被從競爭隊伍中淘汰出來的現實，哪怕僅存一絲渺茫的希望。從金元帝國的美國到貧困的發展中國家的國民，都信仰教育是改變命運的一條確實的途徑，因為能力主義與血統、金錢相比，是比較「公正地」實現社會流動的「梯子」。

與斯里蘭卡相比，1960年獨立的肯尼亞的「後發效應」更加顯著。獨立後僅僅10年，小學生在學率幾乎翻了一番。因為它沒有斯里蘭卡社會那種歷史遺留下來的世襲上層階級，高學歷的取得是到達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也是唯一標志。肯尼亞也沒有斯里蘭卡經濟結構中殘存的家庭手工業，沒有那種繼承父業的處在現代和傳統部門夾縫中間的「未登記部門」那種傳統家庭企業，文憑、證書對於青少年就業來說具有更高的價值。

70年代歐美的許多研究者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教育的開支的增長既沒帶來經濟增長，也沒有縮小貧富差距的現象後，開始對人力資本理論、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產生了懷疑。多爾也是其中一位。他在描述英國學歷病緩慢惡化歷史時，已隱約提到了英國近代教育一直是滯後於經濟發展的。所以，他認為關於教育對經濟增長作用論點，至少是英國教育史的例子是不能為此作證。其實，其他歐洲工業國家近代教育史也如出一轍。雖然多爾是位非常注重實證的教育學者，但可能受英國學術界重視質的分析方法傳統的影響，他不滿教育經濟學研究中的單純經濟學量化、模型的實證手段，認為那不過是經濟學者「玩弄魔術般的數據、公式」，有很大局限性，其解釋正確與否依賴於現實社會與計算方法所要求的各種前提假定之間的吻合程度，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不同因素在起作用，相互交叉、互為因果。所以，單憑量化經濟學統計很難作出正確的預測來。比如說，可能比較正確地預測出工程技術人員未來所需數，但對第三產業的事務性工作的文科大學畢業生所需的預測是很難正確把握的。70年代後，哈耶克(F. A. Hayek)也認為數理統計的預測只不過是一種「知識的狂妄」，精確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方法上的根本區別是：事實科學是研究「內在複雜現象」，只有收集各種各樣變量，才能捕捉到對象的重要特徵，如果謠對某事物作出預測，更需要掌握相互作用的精確的信息。而這些數據並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從相對頻度推斷出來的。所以，他得出結論，社會科學只可能有「結構預測」⁷，卻無法對組成結構的個別因素提供特

別的說明。

多爾和站在篩選理論立場上的學者曾經預言，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的大量產生容易引起青年學生運動，會導致社會不安定。這一擔心可能是多餘的。因為，就二十世紀南亞諸國的經驗來看，並沒有發生他們所說的那麼嚴重後果。而且，日本的事例也顯示出一種相反的結果：日本戰前——從明治中期到二戰結束學校教育體系一直超前發展，造成高等教育畢業生的數量始終超過社會的需求量。長期的就業困難，使得日本的知識青年、知識份子完全屈服於社會現狀，完全喪失了對政府、社會批評精神，乃至幾乎全體追隨、支持政府、軍部的戰爭政策⁹。另外，此書初版的執筆時，正值我國文化革命期間，多爾把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看作是中國政府為解決教育過剩問題的方法來加以讚賞，這只是西方學者的一種隔霧觀花的觀察和誤解。70年代末多爾對文化革命後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就有一種預感「文憑病」將會爆發、流行的憂慮，表示了失望的評價：中國「在教育改革上至少已經不是先進國家了」¹⁰。

三

儘管多爾這部著作出版在26年前，但是，今天我們讀起來仍會感到有不少新意。多爾關注中國教育改革的發展的動向，早在80年代初就訪問過中國，還結識了一些著名的教育家。但是，與人力資本論的「一言堂」、一邊倒相比，20世紀末，劉易斯的關於發展中國家教育的論述和篩選理論，在中國學術界，教育界處於非常孤立的境地。因此，多爾的著作及其「後發效應」，作為後發劣勢說，和受歡迎的後發優勢說相比，在中國沒有影響¹¹。

中國的高學歷者就業難的景象已經在90年代初露端倪。以前人們知道香港、台灣有大學畢業的「菲傭」，但是前兩年，讀報見南京五名大學生屈就去當家庭保姆的報道，似國內媒體還有「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的讚詞；去年，上海《人才市場報》報道一位大學生就業失敗無奈在賓館擦皮鞋，有位重點師範大學的教育工作者竟然不負責任地用套話盛讚這個大學畢業生「從最底層做起」。雖然文章提倡時代的「一種新生的就業觀念」，但是最終也表明擦鞋是為了當總經理¹²。另據報道，1995年碩士研究生的招生數4.3萬，2000年已達8.5萬，幾乎翻了一倍，但是報考人數從15.5萬上升到39.2萬¹³。自2005年起外地人才進入上海市勞動力市場，必須大學本科以上的學歷。時下，上海市區教育局招聘高中教師竟然非碩士生不取，這把「梯子」已高過日本了，想到我國內地農村合格小學教師尚缺，真有「高處不勝寒」之感了。

在執筆這篇書評時，筆者偶然翻到一張2002年3月29日的《中國青年報》，這天該報頭版上有三篇報道：一、《高校畢業生就業有「四利三弊」》；二、《畢業生彩照要上網》；三、《全國大學生素質拓展計劃啟動——63所高校開始試行大學生素質拓展證書》。這三篇報道都是表明這麼一個難以否定的事實：即高校畢業生就業不容樂觀。其中第一則報道《高校畢業生就業有「四利三弊」》一文，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承認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中的「三不利」是：「1、國際經濟形勢面臨衰退，使得就業壓力加大，高校畢業生也不容樂觀；2、高校畢業生迅猛增長，社會有效需求在短期內增幅有限；3、由於計劃經濟的長期影響，畢業生就業觀念還存偏差，就業期望值要求較高。」第二則題為《畢業生彩照要上網》報道說明，人才市場上假文憑泛濫（現在許多幹部以權謀「文憑」，連胡長青這樣的「封疆大吏」也要秘書去買北京大學的「文憑」），故「畢業生彩照要上網」，便於用人單位的驗證。第三則

報道說明，學歷大幅貶值的結果，光有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之外，又增加了一個能力檢驗篩選的「過濾器」—「素質拓展證書」。如果政府忽視了「三農問題」、忽視城市和農村二元經濟的巨大反差的話，那麼，這種由二元經濟導致全民對「文憑」瘋狂的追逐的現象很難消除，要減輕中小學生的學習負擔，改變應試教育、進行所謂的素質教育的改革也只能是一句空話。劉易斯在三十多年前曾經警告，政府把大部分財力花費在大城市的發展，那些曾經想留在農村謀求發展的畢業生也會感到「要留在農村也是很艱難的」¹⁴。今天中國教育部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以下的事實：「高校畢業通向農村的路一直不暢」，「1998年北京生源20,400名畢業生中，農林兩科的畢業生比例僅佔2%，但是就業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實際上並不是農業生產和農村不需要，而是這些學生有了城市戶口，可以到城市就業，誰又願意到農村呢？這種狀況恐怕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改變的」¹⁵。不僅如此，因為城鄉發展的差距擴大，就相對貧困而言，農民的收入停滯以及文憑貶值，初、中等教育的個人收益率低下，導致農民子女的輟學率上升。實踐證明，教育的計劃和預測的研究還有許多局限，近二十多年來，西方國家的教育計劃還沒有成為「一種教育發展的行動藍圖或指南，更多的是一種促進教育有著的重要手段」¹⁶。這幾年，由於就業困難或者個人教育收益率低下，大專和職業技術學院的招生也已經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儘管專科升格為學院，學院升格為大學蔚然成風，但是，以後高等教育內部的序列化，這些三流學校依然擺脫不了困境。儘管在事實面前，有些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者也只得承認中國存在「結構性的教育過剩」，但是，即使就此而言，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1989年國際教育大會發出的第76號建議書的第24條也曾經如此忠告發展中國家：「中等後教育的多樣化，不論多麼受歡迎和及時，無論如何不應導致中等後教育和培訓水平的降低。尤其必須意識到專業培訓工作的過度分散所具有的危險性，而這種危險來自大量自稱能滿足就業指導『急迫需要』的低質量的廉價課程。還應警惕高等教育因向工業部門尋求資金可能屈服於企業經理們不適當壓力的風險」。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教育計劃「面臨的實際問題也不是有多少工作需要受過教育的人，而是在學校的畢業生已經存在著嚴重失業的情況下，繼續把教育體系擴展到怎樣的程度」¹⁷。

註釋

- 1 威廉·阿瑟·劉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 著，施偉、謝兵、蘇玉宏譯：《二元經濟論》（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頁149。
- 2 威廉·阿瑟·劉易斯著，何寶玉譯：《發展計劃：經濟政策的本質》（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頁100-101。
- 3 威廉·阿瑟·劉易斯著，梁小民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頁231。
- 4 曲恒昌、曾曉東：《西方教育經濟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77-78。
- 5 同註2，頁70。
- 6 多爾 (Ronald Philip. Dore)：《學歷社會——新しい文明病》（東京：岩波書店，1976），頁V。
- 7 帕普克 (Freiheit und Ordnung Wissen) 主編，黃冰源等譯：《知識、自由與秩序：哈耶克思想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11、21。
- 8 同註7，頁21-22。
- 9 Earl H. Kinmonth, *The Self-Made Man in Meiji Japanese Thought: from Samurai to*

Salary Man (Berkele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10 同註6，頁XII。
- 11 就筆者的視野所及，肯定、推崇多爾的「後發效應」說的著述，只有鄭建偉的《高等教育規劃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這本小冊子也對70年代以來的各種高等教育規劃的方法研究提出了質疑，可是它在中國學術界也沒有影響。
- 12 程瑩等：〈如何看待大學生當擦鞋匠〉，《人才市場報》（上海），2001年7月28日。
- 13 《青年報》（上海），2001年11月7日。
- 14 同註2，頁69。
- 15 茅廣儒：〈試論我國教育結構的調整思路〉，《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頁14。
- 16 同註4，頁236。
- 17 同註2，頁95。

孫傳釗 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90年代曾經作為客籍研究員遊學於日本同志社大學等多所大學。目前是自由學人，關心的研究方向是中國教育的社會問題、社會倫理中的個人責任問題。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期 2002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期（2002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